

周 儒 齋 選 集



周
觀
武
著



CIP

中國電影出版社

賸儒斋选集

周观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贗儒齋選集 / 周觀武著. — 北京 : 中國電影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106-04031-4

I. ①贗… II. ①周… III. ①中國文學—當代文學—作品綜合集②文藝評論—世界—文集 IV. ①I217.2
②I1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212558 號

責任編輯: 賈 偉
出版策劃: 謝勝強
封面設計: 文 譯
責任校對: 吳 瑩
責任印制: 龐敬峰

贗儒齋選集

周觀武 著

出版發行 中國電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東路 22 號) 郵編 100029
電話: 64296664 (總編室) 64216278 (發行部)
64296742 (讀者服務部) Email: cfpygb@126.com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鄭州匯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 880mm × 1230 毫米 1/32
印張 / 14 字數 / 350 千字

書 號 ISBN 978-7-106-04031-4/I·0951
定 價 45.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周观武先生的自选集。全书分为“学山脚下”“银海滩头”和“花园篱侧”三部分。

“学山脚下”属于文学研究系列，选文九篇，涉及“通感”“李贺”“红学”和“笑话”四个方面。其中，《营造通感效应的条件和技巧》从哲学、生理心理学和文学语境三个方面探讨了激活通感效应的条件和技巧，属于“通感”研究的前沿成果，已被收入《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李贺研究是作者的强项，所选诸文，都有独到见解。“红学”诸文的亮点是善于从《红楼梦》整体艺术构思的高度着眼，环顾全局，慎审细节，持论尖新，自成一家。《把笑话请入文学殿堂》从笑话自身的文学价值、劳动大众的认可度和文学发展史三个方面论证笑话应是一种文学样式，这在笑话研究史上还是第一次。

“银海滩头”属于电影史研究系列。其中，《美国辱华影片兴衰史纲》和《最早闯荡好莱坞的炎黄子孙们》，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研究成果。《昨日黄花有余香》把民国年间的四位电影皇后,以群像形式集中展现在读者面前,也是第一次。《民国影坛风云路》把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巧妙运用于史学著述。从顶层设计到框架结构、行文风格,都能别出心裁,自成体系,是“庄史趣说”的成功范例。

“花园篱侧”属于文学作品系列。此系列以传记文学和杂说为主。它们虽属非典型文学作品,但能融知识和趣味于一体,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典型的文学作品只有《怡然翁梦游记》《俗室铭》和《贻儒吟》等,皆能雅俗共赏,情趣殊多。

代序：回首向来萧瑟处

(一)

我的正业是编辑，在岗三十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人作嫁衣。“述而偶作”，独立做学问，自主写文章，只能算是我的“副业”。

我热上这门“副业”，一半是爱好，一半是命运。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成了《开封师院学报》（《河南大学学报》的前身）编辑部的待业人员。

就在我思考未来之际，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公开发表了。毛主席在信中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就这么八个字，砰然燃起了李贺热。霎时间，捧抬李贺的文章充斥报刊。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应声而作，重新出版了《李贺诗歌集注》。李贺诗歌注本，宋朝以来，不下十余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琦、姚文燮和方扶南三家。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的《李贺诗歌集注》就是这三家注本的合刊。我读过之后，发现姚文燮是三人中把李贺拔得最高的人物，时下吹捧李贺的文章大都与姚氏注本有些关联。于是便有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评姚文燮的〈昌谷集注〉》。写此文时，我没有顾及当时的“主旋律”，而是对姚文燮注释李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批判，并对当时过分拔高李贺的倾向表示质疑。文章一万多字，在《开封师院学报》（今《河南大学学报》）上发表后，很快便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复印（见《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0年第2期）。后来，这篇文章还被收入陈治国先生精选的《李贺研究资

料》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引起了业界重视。

那时候,河南大学的教师们都很看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把它视为国内最有权威的学术资料库。我这篇文章被复印后,河大中文系有好几位老师来向我“祝贺”,说这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第一篇登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论文。华钟彦老教授夸我有做学问的天赋,劝我到 he 主持的全唐诗研究室工作。受到老师们的鼓励,我的“学者梦”骤然亢奋起来。

通过这次“演练”,我悟出了一些做学问的门道。比如:选题要善于在热门中找冷门,或者在冷门中找热门;思考问题要正向思维和逆向思维并用;研究作品要透彻“知人论世”;评判是非要分辨古今价值观念之异同;撰写文章最忌拾人牙慧,没有己见,宁不发声。

有了这些体会,我做学者的信心更足了。我认为,李贺虽然炒得很热了,但是热门中仍有许多“冷题”可钻。于是,我决定在李贺身上继续做些文章,把研究李贺视为“圆梦”第一站。

可是,我的“学者梦”很快就受到了挫折,原因是要调我去河南省公安厅编辑《河南公安》。

我实在不愿干公安,便以“政治不合格”推辞。可是,那个时代,个人命运都是捏在“单位”手里的,合格不合格,单位可以随便说。两方“单位”已经捏弄好了,不愿意也得去。就这样,我被调进了河南省的最高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那里一干就是四年。

这四年里,我组稿、采访、写评论,什么都干,终日忙得不可开交。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改换门庭,我决定白天忙碌干公安,夜里抽闲搞李贺,攒点改换门庭的本钱。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李贺的文章,大都是这四年中酝酿的成品、半成品。这些文章,一度引起业界注意。广州教育学院的陈莹老师和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王玲同志(我们原本不认识),曾经主动约我合著李贺专论,大纲、分工都已敲定,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困难,未能

成书。

我在李贺身上做过二十多篇文章，本集选入六篇，基本上代表了我李贺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其中我最看重《评姚文燮的〈昌谷集注〉》、《李贺歌诗比兴得失谈》和《一首别具风格的颂歌》。不只是它们都有新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们最能体现我的治学方法和思辨特征。

这四年中，我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写成了《通感描写的条件和技巧》。

1981年，我看到钱钟书先生新出的小册子《旧文四篇》，很感兴趣，尤其是其中的《论通感》一文，更是新鲜。研读中，我发现钱先生所列举的“通感”例句，大都精彩，但是也有个别例子似有所隔，“感而不通”。为什么会这样？这便激发了我的探讨欲望。《通感描写的条件和技巧》就是我的思考成果。钱先生的文章以大量的例子证明了“通感”已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广泛应用；我的文章则是在钱先生的基础上深入一步，从哲学、生理心理学和文学语境三个方面探讨了激活通感效应的条件和技巧。此文初载《中州学刊》1982年第一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同年第六期复印。

没曾料到，这篇只有五千多字的文章，竟会受到有关学界青睐。1999年，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世界学术文库》时，编辑部来函要求收入这篇文章。我看该社是国务院研究室主办和主管的出版机构，不敢怠慢，便将校审稿寄了回去。就这样，《通感描写的条件和技巧》被收入《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第一辑）。接着，便有各式各样的函件飞来，不是获奖祝贺，就是入编通知。例如，2000年我曾收到“世界华人交流协会”邀我参加“国际优秀论文评选”的通知，信封内还特地附一便条，内称：“您系由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总干事、国际优秀论文评选委员会主任陆虬先生特别提名推荐，欢迎您投寄作品。”我不认识陆虬先生，甚至连“虬”字的读音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特别提名”推荐我呢？不知底细，没敢回应，

现在想来,是我不识抬举了。

再如,2011年我曾收到一份获奖通知,内称:“经有关部门、新闻机构和行业组织的热忱推荐,阁下的《营造通感效应的条件和技巧》论文,题材新颖,结构严谨,思路明确、内涵丰富,赋有较强的思想意识和独特的创新理念。该成果在理论界引起广泛关注,为有关专业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价值。经国际专家评审委员会在本次参选的三十七万二千六百六十份成果中审核论定,该成果在本次‘世界华人优秀创新成果’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国际金奖。成果档案号:ZL12-05。在此向阁下表示祝贺!”

通知中还说,这次评选活动是“世界华人文化名人协会”“中华全国管理创新研究会”“海内外经济纵横杂志社”和“世界文化艺术研究院”四个行业组织联合举办的。我不知道这个评选活动是否靠谱,没有回应。但也足以说明,这篇文章在社会上确实有些影响。

这里提到的《营造通感效应的条件和技巧》和《通感描写的条件和技巧》是同文异题。一篇文章怎么会有两个题目?其中确有一段缘故。

1983年底,我终于跳出河南省公安厅,调到了河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旗下的《中州今古》杂志编辑部。次年春天,在北京工作的河南籍著名人士冯友兰、曹靖华、姚雪垠、李准、魏巍、白寿彝、王国权(当时的民政部长)等,应邀出任《中州今古》杂志顾问,编辑部委派我和同事刘翔南进京向他们敬呈“聘书”。诸位顾问都很关心家乡的史志工作,非常欢迎我们到访。

和冯友兰老先生约定的见面日期是1984年3月30日下午。我和刘翔南如约去到北大燕南园时,冯老的女婿蔡先生已经等在门口。进入冯老的家门,是一条走廊,右侧靠墙全是书架,人行其间,就像走进书库一样。不大的会客室里,除了沙发茶几,别无长物,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铁锈斑驳的物件,形似漏斗,倒扣在茶

几中央,看上去并不美观。茶几上的几本《中州今古》和《中州学刊》显然是特意预备的。蔡先生给我们倒上茶水,然后去请冯老。稍顷,冯老慢步来到客厅。我抬头一看,不由一惊,老人家已经 89 岁高龄了,长髯飘胸,精神矍铄,令人望而起敬。

冯老高兴地接过“河南省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学术顾问”和“《中州今古》杂志顾问”聘请书,连声说:“好,好,这是家乡对我的信任,我很高兴。”然后坐下,轻声徐语,和我们攀谈起来。

冯老首先谈了他对编纂河南省志和《中州今古》建议。当他知道我曾经在河南大学工作过时,高兴地说:“咱俩是先后同事啦,我也在河大工作过,1925 年离开的,那时候叫中州大学。”冯老问我研究些什么,我说:“在母校的学报上发表过研究李贺的文章,还写过一篇《通感描写的条件和技巧》,发表在《中州学刊》上。都是二流刊物,羞于示人。”冯老笑着说:“《中州学刊》是家乡办的,每期我都要看,办得不错。最近有篇考证墨子故里的短文,就很重要。如果它的观点成立,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分布就得重新考虑。你这篇研究通感效应的文章,我也看了。‘通感’是钱钟书先生的发现,很有价值。就我所见,研究通感的文章,都是在围着钱先生打转转,就你这篇深入一步,有一定穿透性。我看,通感不只在文学方面,在其他艺术领域也有应用,值得继续研究。”我俩谈话时,刘翔南一直在聚精会神地观察茶几上那个“漏斗”。冯老似有所察,赶紧扭转话题,指着那个物件介绍说:“这是战国时期的铁器,可能是照明用具,比较罕见。”刘翔南专业历史,又很健谈,二人接上话茬,聊得非常热乎,这时轮到我做旁听生了。直到蔡先生再次走进客厅,我们才发现已经聊了将近两个小时(预约的见面时间是一小时),只好起身告辞。

我意识到,冯老的话是在委婉地点拨我。和冯老说的“通感效应”相比,“通感描写”显然有失准确。所以后来再有书刊要求收载此文时,我便把标题改成了《营造通感效应的条件和技巧》。受冯

老启发,我还打算再写一篇《通感效应在艺术领域的广泛应用》。遗憾的是自己功底不足,直至今天未能成文。这大概就是“江郎才尽”吧!

“学山脚下”单元中还有两篇“红学”文章。

从脂砚斋算起,《红楼梦》已经热炒了二百多年,新旧“红学”家成群结队,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我这个外行人怎么还敢沸鼎染指呢?是胡适博士启发了我。

1988年夏天,我在图书馆看到一本《脂评石头记》甲戌本的影印本。据胡适先生说,这个只有十六回的本子“乃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出于好奇,我便借回家来。

往日读《红楼梦》,总觉得秦可卿有点冤。“兼有钗黛之美”的秦可卿给我的总体印象挺可爱的,怎么到了某些“红学”权威的笔下,就成了淫荡邪恶的罪魁祸首呢?仅凭一幅“美人自缢图”和贾宝玉的“一厢性梦”,还有焦大那句不着边际的骂语,就判定秦可卿是“造衅开端实在宁”的红颜祸首,够吗?

往日读《红楼梦》,纯为消遣,从不关注什么版本问题。读了“甲戌本”和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之后,我才恍然,原来秦可卿的死法存在两个不同版本:早期的版本是自缢,后来的版本是病死,而且是曹雪芹自己改定的,为了和修改后的内容相适应,回目也由原来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改成了“秦可卿死封龙禁卫”。也就是说,是曹雪芹亲手为秦可卿翻案,把“红颜祸水”的秦可卿改判成了“红颜薄命”的秦可卿。

曹雪芹为什么要如此改变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全面理解《红楼梦》的整体艺术构思相当重要。探究的欲望油然而生。

要窥视曹雪芹删改“天香楼”一节的真正原因,就必须知道删去的大体内容是什么,进而分析被删去的内容和《红楼梦》的整体艺术构思之间有无矛盾,能否兼容。

脂评甲戌本第十三回有一则眉批说:“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

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删去的四五页没有流传下来，具体内容当然谁也不知道。有幸的是，回末的总批中还有一句：“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所谓“史笔”，首先是“直书其事”，其次才是“微言大义”。如不“秉笔直书”，“微言大义”就失去载体，“春秋笔法”就毫无意义。所以，“淫丧天香楼”既然用的是现实主义，是“史笔”，就不可能不写秦可卿“淫丧”事件的来龙去脉。“秦可卿死封龙禁卫”是由“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改写而成的，前后格调虽然迥异，但是内容不可能完全没有关联。只要我们站在《红楼梦》整体艺术构思的高度，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多维度地审视《红楼梦》中所残留的与“天香楼”事件有关联的全部信息，依情依理，设身处地揣摩秦可卿、贾珍等人在特定情景中所应有的特定心态和必然反应，被删去的内容总是可以推测出来一些的。

基于这个思路，我写成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新臆》一文，从《红楼梦》总体艺术构思的高度，分析了曹雪芹为秦可卿“翻案”的三大原因。文章在《中州学刊》1989年第四期上发表后，也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复印（见《红楼梦研究》同年第四期）。

在写作“新臆”一文时，我发现许多红学家犯着一个共同错误，就是视“脂批”如圣旨，钻进“脂批”的牛角里出不来。例如脂砚斋的一句“不写之写”，就能把这些红学家迷得晕头转向。为了维护这句脂批的“权威”，他们死也不肯承认曹雪芹已经亲手把秦可卿由“吊死”改成了“病死”。他们非要秦可卿转成慢性病，拖上两三年，然后自缢在天香楼上。殊不知这么一来，宝玉钗黛都得平添两三岁，大观园的文章就做不成了，秦可卿的“龙禁卫”也没法封了。为了配合秦可卿的“慢性病”，他们还要贾瑞也病上一两年，理由是贾瑞年轻力旺，不会病半年就死。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竟然忘记了患病不到半年就死了的秦钟、晴雯也很年轻。像曹雪芹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创作思维是非常复杂的，再了解“内幕”的批评家也不可能洞察曹雪芹创作思维的全部奥妙，脂砚斋不会例外。

我认为《红楼梦》中有关秦可卿吊死的文字残留,可能是作者疏忽,也可能是誊抄者笔误,还可能是作者生前没来得及删改干净。《红楼梦》毕竟是曹雪芹的未竟之作,流传的又是手抄本,什么样的差错都有可能。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领悟《红楼梦》的整体艺术构思,至关重要。《也谈〈红楼梦〉中有关秦可卿病死的几处疑点与笔误》,就是我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考查和研究。

文章在《河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之后,引起了有关学界的注意。至今,我收到的人编通知不下四五种。199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召开“改革开放二十年理论前沿学术研讨会”,还把我这篇论文“正式确定”为会上交流文章,邀我参加,我没敢去。不是我架子大,是我有自知之明。与会者都是“大家”,我只是偶然一得,怎敢班门弄斧?

“学山脚下”的最后一篇是研究笑话的。1998年,葛培岭先生把冯梦龙的《笑府》《广笑府》和《古今笑》加以整理,合刊出版,冠名《墨憨斋三笑》,要我写文推介。我先后写成《好个三言姊妹篇》和《把笑话请入文学殿堂》,发表后引起笑话研究者的注意。特别是《把笑话请入文学殿堂》一文,从笑话自身的文学价值、劳动大众的认可度和文学发展史三个方面论证笑话也是一种文学样式,这在笑话研究史上还是第一次。

以上所述,就是“学山脚下”诸文艰难出炉的大致情形。

这本选集共分“学山脚下”“银海滩头”和“文苑篱侧”三个单元。

“学山脚下”属于文学研究系列,涉及“通感”“李贺”“红学”和笑话四个方面,共选十篇文章。关于这一部分,我的总体评判是:

海望尽头天作岸,山登极顶人为峰。

文昌从来不私我,仰望峰巅愧无能。

唯有文风敢自诩,不齿学舌自发声。

(二)

“银海滩头”属于电影史研究系列。

我写作“学山脚下”系列,纯属兴趣劳动,虽然辛苦,但也快乐。至于写作“银海滩头”系列,缘起却非出于爱好,而是我被“逼上梁山”之后随缘采摘到的“山茶野果”。

1986年9月,我终于如愿以偿,调到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上班伊始,就碰上一个大项目:我们的院长胡思庸先生和河南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编辑出版大型辞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词典》。胡院长任主编,约请的撰稿人全是省内外知名大学的专家、教授。我因当年在《河大学报》工作时为胡院长编辑过《韩非子故事释评》,出于信任,得以参与。交给我的任务是撰写文学、艺术方面的全部词条。我因对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门类过于陌生,便以任务过重为由,请求再增一人和我共同承担。结果,领导把文学部分交给了我的同事王广西先生,其他艺术门类,包括戏曲、话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雕塑、建筑、工艺等等,全部落到了我这个门外汉的头上。

那时候,话剧、音乐、舞蹈之类,可以参考的辞书基本没有。电影方面,虽有一部“词典”,但以解释“推拉跟摇”之类的技术词语为主,对我基本没有参考价值。戏曲和美术方面已有辞书出版,但都缺乏现代部分。也就是说,我所承担的任务,从词条设置到内容诠释,大部分都得从零开始。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该是多么大的难题!但因这是新单位对我的“初考”,我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我被“逼上梁山”之后,终日埋在图书馆里,翻旧书,看旧报,阅读各种回忆录,一点一滴地搜集资料。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我终于写出五十多万字,如期交稿。

又过了一年,出版方委派的责任编辑鲁金寰特地把我请到他

的办公室,说是书稿已经收齐,但因大都行文过于冗长,难以成书。胡院长实在忙不过来,希望我来帮助把稿子通改一遍。我想,还有那么多的知名专家教授副主编,我算老几?于是婉言谢绝。结果,一拖就是十年,直到1997年胡院长不幸病逝,鲁金寰也跳槽远飞,工程浩大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词典》终于胎死腹中。为了弥补损失,我去游说王广西,建议把我们两个人的稿子合璧,取名《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词典》,附上“大事记”,另寻出路。王广西认为可行,去和中州古籍出版社联系。出版社领导说正缺这门词典,欣然同意。1988年,一百多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词典》终于面世,我和王广西的稿子幸运“死里逃生”。

1994年,我在病床上躺了六个多月,不能做事,只好胡想。那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词典》的命运。我已为它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一旦流产,岂不冤枉?为了“堤内损失堤外补”,我盘算写一本民国电影发展史,让手上的资料多开一朵花。

当时,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已经权威面世。在我看来,此书有两大不足。第一,它是极左背景下的产物,对旧中国的电影现象多持偏见。第二,过于正襟危坐,严面肃语,可读性很差,一般人难以卒读。我要成功,就必须避其所短,另辟蹊径。我的招数就是走“庄史趣说”道路,力求把庄重的历史知识融会在饶有趣味的文字载体之中。

我想,既然是史,就得出言有据;既讲发展,就应略具系统;既要有趣,就得多加趣料,化无趣为有趣,令读者喜闻乐见。为了达到这个并不容易达到的目标,首先必须有个好的顶层设计。

于是,我决定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以史为经,以趣为纬,先扣紧电影史上不可阙如的名人、名片和重要事件,拟出八十个回目,大致以时间为序,排列成串。然后再以每个回目为绶纽,上牵下连,左萦右绕,尽量把有关的历史知识和可以启迪后人的

名导趣闻、明星轶事、名片内幕、影坛掌故,以及一切有关的妙人妙言妙事,连同自己的见解,一并编织到各回之中,真正做到熔知识、学术、趣味于一炉,力求把每一回都编织成一个可以独立成篇的知识网络。这样,纵看全书,是编年的、系统的;横看各回,是断面的、专题的、有趣的。通过这种经贯纬绕、点线结合的结构形态,清晰勾勒出旧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轨迹。

病起之后,很快成书,定名《民国影坛风云录》。先有武汉黄泥街书商前来洽谈,愿以不菲的价钱买断版权,条件是允许印成 16 开本,地摊销售。我不忍心把它弄成地摊读物,没有同意。后与河南大学出版社洽谈,一拍成交。

《民国影坛风云录》于 1995 年出版,成为河大出版社当年推出的畅销书之一。如今,有些网站已把它列为影视剧考研生阅读书目。

此书上市之后,很快便有报刊向我索稿。什么明星轶事,名导趣闻,名片内幕,影坛第一,如此等等,都受青睐。我也着实忙活一阵,将写成的长文交给杂志,短制打发报纸,总计不下五十篇。“银海滩头”系列中的《民国年间的四位电影皇后》、《从红灯区冉冉升起的明星》等文,都是这本书的衍生产品。

我收集的电影资料中,有一份是美国某国际问题研究所收藏的有关电影方面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立场当然是帝国主义的,主旨是如何实现美国电影利益最大化。难得的是这个报告中列举有从 1896 到 1954 年间美国银幕上描绘中国和中国人的主要影片及其有关资料。我从这些影片资料中看出一种倾向,就是美国出品的“以蔑视中国和中国人为神髓的各类影片”(这是我给“辱华影片”的定义)呈现着从孳生、泛滥到衰歇的态势。我想,如果全方位地考察一下形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很有现实意义。于是,我就把美国出品的“辱华影片”作为研究对象,广泛收集资料,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商业、民间交流、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等方面加

以审视,于1977年写成了《美国辱华影片兴衰史纲》。但因篇幅过长,刊物不便刊载,我只好把它分成《略论美国辱华影片的滋生和泛滥》和《略论美国辱华影片的衰退和消歇》两篇文章,先后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和《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上发表出来。我想,“辱华影片”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这两篇文章未必精到,但属初创,资料难得,分别发表在两个刊物上,容易流散,如能配足图片资料,印成单行本,岂不更好。可惜图片来源成为难题。为此,我曾到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寻求合作,他们也是爱莫能助。2003年,《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副主编张义兴先生来索此稿连载,《美国辱华影片兴衰史纲》才得以整体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美国辱华影片”由盛而衰的原因很多,其中,民间交流和文化人的互相了解,至关重要。我在收集这方面资料时,被关文清、黄宗霭等人的传奇经历所感动,于是写成《最早闯荡好莱坞的炎黄子孙们》,在《名人传记》1996年9期上发表后,反响很好。《名人传记》要我继续供稿。我又为他们写了《话剧皇帝金山的秘密使命》和《南国影后李绮年外传》。

这些文章走的都是“庄史趣说”路线,颇受读者欢迎。特别是“李绮年外传”,还引来半场“官司”。由头是《名人传记》编辑部收到马鞍山钢铁股份公司的一位读者来信,内称:“请把这份剪报转寄给《名人传记》总第144期中《南国影后李绮年外传》的作者周观武先生,因为有人侵权了,让他起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报纸是从新华日报主办的《服务导报》上剪下的,标题为《魂断影星路》,作者高程远,分上下两期连载。我查对一下,除了将时代改为今天,地域改在四川,李绮年等人的名字全部改变之外,情节和主要内容,甚至整段文字,连同标点符号,都是照抄不误。我发函到南京和《服务导报》编辑部联系,回函承认属于严重侵权,但说文责自负,要我去和远在四川的高程远理论。我哪有这种心情,赶紧束手了事。